



稀世珍品胡王印 印证民族大融合

胡王印



胡王印上的印文

□记者 李燕锋 见习记者 程芳菲 / 文 记者 张晓理 见习记者 张斌 / 图

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丕废汉建魏,定都洛阳;曹魏元帝咸熙二年(公元265年),权臣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废魏建晋,仍定都洛阳,史称西晋。

曹魏、西晋时期,西域诸国纷纷遣子入侍,表臣属关系。与前朝相比,西晋王朝明显加强了对西域各国的控制。为让大家了解曹魏、西晋时期丝绸之路对洛阳的影响,我们从众多展品中选取了一枚金印——晋归义胡王金印,让这枚金印来反映西晋时期在丝绸之路的影响下,西北少数民族归晋的事实。

跟着文物“逛”丝路

辗转千余年,洛阳商人偶得之

晋归义胡王金印陈列在洛阳博物馆丝绸之路展厅。因为这枚金印个头太小,为了让大家看清楚,负责布展的工作人员特意将金印放在一面放大镜下。透过玻璃柜,我们看到这枚金印呈正方形,上面有个小小的印钮,似为骆驼形状。

在放大镜下,我们看到印章上刻有文字,属白文篆书,这几个字是“晋归义胡王”。洛阳博物馆工作人员孙章峰介绍,这枚金印是西晋时期的,高2.6厘米,长和宽各2.2厘米,重83.2克,70%的含金量。

“晋归义胡王”,这5个字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枚金印?孙章峰说,归义,即归化、降顺的意思,胡王即当时北方少数民族匈奴的首领。

孙章峰说,晋朝时,匈奴首领归顺的事多发生在晋武帝时期,因此,这枚金印应是晋武帝时的物品。显然,这是当时朝廷安抚少数民族的一种手段——通过赐予金印,两者之间建立友好关系,以减少边疆战争。

赐予归顺少数民族首领的金印为何会出现在洛阳?原来,这枚金印并不是在洛阳出土的,而是被一名洛阳商人偶然买到的。据说,20世纪40年代,孟津一名商人到甘肃经商时,无意中在古董商人那里看到了这枚金印。也许是懂得上面文字的重要意义,也许是看这枚金印制作考究,他买了下来。

20世纪80年代,这枚金印由洛阳博物馆保管。

一枚稀世珍印,一段历史印证

古时的印章和今天的印章作用是一样的吗?这种驼钮的印章形制又有什么讲究?对于这枚印章最初的用途,我们充满了好奇。

孙章峰说,古代的印章大都随身携带,要么佩戴在主人腰间,要么系在手臂上,因此,最初的印章顶部都钻有圆孔,以使用绳子穿系。后来,由于人们的爱好不同,有的人便在印章顶部铸制或雕刻简单的装饰,印钮便由此产生。

驼钮多见于东汉至两晋十六国时期颁发的少数民族官印。东汉时,驼钮形象逼真,

驼的五官及毛发铸刻清晰,易于辨认,但到了魏晋时,驼钮的造型就变得比较简单,在赠给少数民族首领的官印之首署上“汉”或“晋”字,下为民族名,并在民族名的前面或后面加上“归义”二字。

古时的印章作用和今天的是否一样?我们了解到,印章在古代不仅是持信之物,还是权力的象征。原来,汉代就有官印制度,而且对玺印的文字数以及官职名称,特别是对印的材料、绶带、钮制都作了规定。以铜为材料铸制雕刻的印章称为铜印,铜印有青铜、红铜、黄铜、鎏金铜等不同铜质之分。宋以前的印章绝大多数为铜印,主要分成官印、私印两大类。以金、银为材料铸制雕刻的印章分别称为金印、银印。金银是贵重金属,故金银印章不是普通人所能使用的。

孙章峰说,此印的印文布局严整,字迹规整刚健,造型古朴,是我国古代玺印中的佳作。

一枚稀世珍印,印证民族融合

边塞文物晋归义胡王金印造型粗犷,体现的是自汉朝以来朝廷对少数民族首领实行分封赏印的传统。

最重要的一点是,晋朝赐予少数民族的王印多为铜质或鎏金质,而这枚印为金质,和赐予内地诸侯王的印章质地相当,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晋朝时期在丝绸之路的影响下,朝廷与西部少数民族之间的复杂关系。

孙章峰介绍,西晋统一后,洛阳再度成为三条丝路东端的起点,四夷朝贡的中心。同时,沿着丝绸之路,天涯海角的特产也汇集京城,洛阳成为一座国际性大都市。

除了经济交流外,魏晋时期洛阳和西域等地的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这种文化交流主要体现在魏晋儒家文化的传播方面。

据介绍,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开始,儒家文化就成为中国的正统文化。东汉明帝时,统治者一方面学习西方的佛教文化,一方面坚持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通过四夷王入学洛阳太学的制度,向外传播儒家文化思想,洛阳太学也因此成为国际性的儒家文化教育中心。

西晋建立初年,武帝司马炎为了促进民族融合,更是利用洛阳太学这个国际性的教育机构,加强儒家文化向四夷特别是西域的传播。西晋统一后,西域诸国到洛阳太学求学的人络绎不绝,这种盛况一直持续到“八王之乱”爆发后才停止。

隋唐时期——

各色商品经运河 汇集繁华洛阳城

跟着文物“走”运河

□记者 李燕锋 见习记者 程芳菲 / 文 记者 张晓理 见习记者 张斌 / 图

隋唐时期,关中和中原两大经济区的发展步伐缓慢,而江南、江东地区经济迅速发展,这就使长安、洛阳的物质得依靠江南、江东地区供给。

大运河开通后,各色商品汇集洛阳,洛阳成为中原地区向四周辐射的一个经济重心和国内贸易的大市场。在“运河中枢——大运河与洛阳”展中,那一件件精美的瓷器便是“徜徉”在大运河上的众多商品的代表。



精美瓷器

样样瓷器都精美,沿着运河聚洛城

“运河中枢——大运河与洛阳”展厅内,摆放着许多独立的展柜,里面放置的多是一些隋唐时期的瓷器。

看到这些瓷器,许多参观者不免会产生疑问:大运河与洛阳的展览中,为何要摆放这么多瓷器?在大运河的兴衰历史中,瓷器“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负责布展的洛阳博物馆陈列部工作人员齐磊解释,隋唐时期大运河的开通,使东都洛阳拥有便利的水运条件,而水运是最适合运输瓷器等不便于陆路运输的物资的渠道。正因此,这些瓷器便成为隋唐大运河历史地位的见证。

这些瓷器中,既有唐代白釉双龙尊,也有具有明显南方特色的长沙窑执壶等。齐磊说,在陆羽的《茶经》中曾提到唐代名窑有七处,其中,越、鼎、婺、岳、寿、洪等州盛产青瓷,邢窑盛产白瓷,这些烧制瓷器的窑口大多分布在南北大运河附近。因为把瓷器运往其他地方,大运河是最佳的渠道。

齐磊说,和这次展出的瓷器性质一样,在洛阳历年发掘的唐墓中,还出土有很多尊、罐、瓶等瓷器,这些都充分说明在隋唐时期,瓷器是依靠大运河运输的一类商品。

各色商品齐聚洛 催生商业大繁荣

“粉细越笋芽,野煎寒溪滨。”这是唐代诗人刘言史的《与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的诗句,描绘的是作者与孟郊在洛北野外煎饮越州茶的情景。

其实,和瓷器一样,茶叶也是“徜徉”在大运河上的众多商品之一。

据了解,唐代,由于茶叶多产自巴蜀、江淮、两湖等地区,茶商大都从这些地方收购茶叶,贩运四方,而贩运的最佳通道便是大运河。资料显示,茶叶除了销往国内各个城市外,还

销往一些以肉食为主的游牧民族聚集地。“除了瓷器、茶叶,还有丝绸、唐三彩等,隋唐时期的洛阳因处于运河的交汇处而成为向海内外输出物资的国际性大都会,其商业地位是当时其他城市或地区不能比的。”齐磊说,隋唐时期,各地丝绸汇集于洛阳,来往于路上的中外客商不仅在洛阳进行丝绸交易,还把丝绸输往中亚、西亚或欧洲等地,近年来在丝绸之路上发现的不少丝织品遗存就是例证。

沟通东西和南北 洛阳城一片繁华

南北各地的瓷器、茶叶、丝绸等商品在洛阳汇集,进入市场交易后,有的还能沿着丝绸之路“走出”国门。

在伊阙首都德黑兰郊区的一处遗址中,曾发现过8世纪至9世纪的邢窑白瓷盆、菱花盆等;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东南的一处遗址中,同样发现了邢窑的白瓷和越窑的青瓷等;而伊朗的席拉夫为波斯湾古代繁荣港口之一,1965年以来该遗址中发现大量我国的瓷片……专家推测,这些中国的古代瓷器,可能是通过丝绸之路运出来的。

根据史料记载,隋唐时期的洛阳城因拥有繁华的商业市场,吸引了西域等地的商人,他们纷纷将各自国家的商品销往洛阳市场,如胡粉、香料、胡服、胡饼等,诸多外来商

品的输入,使得1000多年前的洛阳城一片繁华。

在武则天时期,为招待各国使者和客商,朝廷特意在洛阳的从善坊设立了鸿胪寺。到了延载元年(公元694年),武则天下令铸造天枢时,旅居洛阳的番客商胡捐钱达“百万亿”……可想而知,当时西域商人在洛阳经商人数之众和财富之殷。

其实,不论是洛阳发现了南方的瓷器也好,亦或西域发现了洛阳的丝绸也好,这些实例告诉我们的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隋唐时期的洛阳,因为有着大运河沟通南北,丝绸之路贯穿东西,已经是中原地区向四周辐射的经济重心和国内贸易的大市场,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